

# 学历与身份：特定时空下的链接

向冠春

[摘要] 探讨学历与身份的关系,核心议题是高等教育与身份的关系,即高等教育的身份功能。在我国古代、近代、当代不同历史发展时期,学历与身份的关系表现出不同特征,学历与身份的链接时强时弱,甚至在特定历史时期被硬生生地割断。改革开放恢复高考后,学历与身份的关系重又翻开新的篇章。恢复高考以来的20世纪80~90年代和21世纪的今天,学历与身份的链接也经历了初显、滥觞、分裂三个发展阶段。追忆历史、解读当代、展望未来,我们应该对学历与身份的链接也即高等教育的身份功能有一个理性的认识。

[关键词] 学历;身份;链接;高等教育;社会流动

[作者简介] 向冠春,供职于教育部考试中心,管理学博士,北京 100084

[中图分类号] C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4434(2011)09-0207-06

## 一、关于学历与身份

在现实生活中,“身份”一直是比较敏感的词汇,因为它涉及到一个人在社会等级序列中所占据的位置。“身份”对应的英语单词主要有两个:identity和status。Identity的释义是:同一性、一致性、身份、本身、本体。status的释义是:身份、地位、情形、状况。词典的解释是“身份是指自身所处的地位”或“受人尊重的地位”。不同学科对身份的理解不同,社会学角度的界定更倾向于status。社会更注重挖掘、审视和批判status在社会现实生活所含有的“高低尊卑”的意味和不平等的社会安排。社会学家韦伯关于身份的阐释值得我们关注,他主要从“生活方式”和“社会声誉”两方面对“身份”作出界定。他认为:“‘身份’指的是在社会声望方面可以有效地得到的肯定或否定的特权,它建立在如下的一种或数种因素基础之上:(1)生活方式;(2)正式的教育过程,包括实际经验的训练或理性的训练,及与此相对应的生活方式。(3)因出身或因职业而获得的声望。”<sup>[1](P125)]</sup>其他社会学者也从“地位与角色”、社会分层、社会流动等方面阐释了“身份问题”,这些

阐释为我们理解教育(学历)与身份问题提供了重要启示,其中不乏关于教育(学历)与身份问题的直接论述。

学历与身份并不是从人类社会伊始就必然联系在一起。人在社会上的地位,一般是按照拥有资源的程度而划分,包括有形与无形的资源,如土地、金钱、家庭出身、教育等等。地主拥有土地,资本家占有基本的生产资料,他们是拥有高身份地位的阶级(阶层)。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类文明的发展,教育(学历)在个体身份获得中显示出愈益重要的作用,不论是上层社会出于稳固自己统治地位的需要,还是普通民众出于提升自身社会地位的需要,不同社会阶层都开始加入了对教育这一无形资源的争夺中,于是“学历社会”相继在不同地域、不同国家上演,学历与身份的链接在不同社会也显示出不同特征。

## 二、学历与身份：高等教育功能的中国解读

探讨学历与身份的关系,核心议题是高等教育与身份的关系,即高等教育的身份功能。因为高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2007年度规划基金项目“高等教育发展与社会变迁——个体、群体、组织的视角”(07JA880047)

等教育相对于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来说,与社会联系更加紧密,对社会的影响更深刻;相应地,对个体影响更大,在个体的社会成就取得、社会地位提升、社会身份获得过程中发挥着更大作用。

### (一)中国古代的教育身份功能

本文在古代部分主要笼统地论述教育的身份功能,而不是把高等教育单独提出。

学校教育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居于统治地位的奴隶主阶级和封建主阶级,急需建立专门传授文化知识的机构,让他们的子弟学习已被总结和整理出来的文化知识经验”<sup>[2](P16)</sup>,于是古代学校教育产生了。早期学校教育只能为社会中脱离生产劳动的贵族及其子弟等少数人所独享,广大劳动民众是被排斥在学校之外的,只能在生产和生活中接受基本的生活教育和被迫接受统治者实行的教化,学历与身份获得的关系还没有建立起来,教育对于促进社会成员的社会流动作用微乎其微。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文明的进步,教育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社会地位的获得与教育的关系也开始萌芽。西周实行“选士”制度在先秦文献中记载较多。“可以认为,西周的选士是我国考试制度的萌生阶段,它对后世的学校考试、用人考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sup>[3](P1)</sup>其后,汉代的“察举制”、“九品中正制”都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学历与身份的链接。但在我国古代时期,真正把学历与身份明确地联系起来,并发展完善的是科举制度。科举考试产生于隋朝,发展形成于唐朝,经历了宋代的改革、明代的极盛,到清末走向了衰亡,是我国封建社会中持续时间最长、影响范围最广的选士制度。隋唐以前的选士制度是以荐举为主,考试为辅;隋唐以后的科举制是以考试为主,荐举为辅。科举制存续 1300 多年,对我国古代社会发展、社会分层产生了重大影响。

从中国古代的社会分层来看,主要有四个阶层:士、农、工、商。士指通过科举来获取功名的读书人;农是以农、渔、牧业为生的人;工是在制造、运输、建筑等领域做工的劳动技术人员;商指自由小工商业者,且“士”为四民之首,“士农工商”结构体系从根本上突出并保障着士子们独特的社会地位<sup>[4](P62-63)</sup>。自科举制度之后,士农工商的社会秩序更加深入于社会的各个阶层,“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成为民众共识。学历与身份的链接也随着科学制度的兴盛而达到了极致!

当时社会所流行的一些话语,非常生动地反

映了古代时期学历与身份的特定关系。如“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家无读书子,官从何处来”;“欲昌和顺须为善,要振家声在读书”;“好学者则庶民之子为公卿,不好学者则公卿之子为庶民”;“蒿草之下还有兰香,茅茨之屋或有侯王”。这不仅是对读书求取功名的人的利诱和鞭策,更是当时科举促成社会阶层流动的真实写照。从教育社会的角度审视,科举制可以说是我国古代时期地位自致的绝好范例。它充分发挥出了教育的身份赋予功能,是考察中国语境下的教育身份功能的绝好范本<sup>[5](P44)</sup>。

### (二)中国近代的高等教育身份功能

从 1840 年到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前的 100 多年间,中国的社会结构经历了剧烈的变动,中国社会从改良到革命,从旧民主到新民主,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仅仅用了近百年的时间,我们在短短的百余年时间内超过了西方社会由中世纪到近代演变的数百年的行程。在这一时期,“士农工商”的金字塔状的社会等级结构初步被打破,社会阶层之间的分化与融合加剧。士绅阶层发生了分化,出现了独立于传统士阶层之外的现代职业阶层、商人阶层、市民阶层、军人阶层、新知识阶层。

近代中国教育处在新旧交替时期,正规教育和民间教育、西式教育和传统教育等共同作用于个体的流动。学历与身份的关系虽不像科举时代那样紧密与稳定,但并没有断裂,当时的新式学校教育、留学教育等仍然促进了一大批有识之士向上层社会流动。

鸦片战争以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中国逐渐酝酿发展了新式教育。19 世纪 60 年代兴起了洋务运动,洋务派在发展我国近代工业的过程中,十分注重发展教育。他们以人才教育、专业教育为中心,翻译西方书籍,建立了 30 多所外国语学堂、军事学堂、技术学堂等。新式学堂教授实用知识,培养了大批为社会所欢迎的实用人才。这些新式人才极大地推动了当时动乱国家的发展,他们自身也获得了不菲的身份与地位。

中国近代的留学教育始于 1872 年第一批留美幼童,是洋务运动教育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派遣留美与留欧学生。后相继出现了留日、留法热潮。许多留学生归国,在政界、商界、教育学术界很多,其中从政的人员最多,“1936 年对 4933 名回国留学生的调查发现,从政者多达 1558 人”<sup>[6](P288)</sup>。“中国近代特殊的国际地位和时代氛围,造就了中国留学生特殊的社会地位和权力,使得他们成为

中国近代各个领域的领袖”<sup>71(P34)</sup>。

### (三)改革开放前的高等教育身份功能

自1949年至1978年期间,我国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建立起了新社会。中国的社会分层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整个社会形成农民、工人和干部三大阶层,以身份为基础的社会分层制度开始形成。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城乡之间的严格二元社会身份分层制度;另一方面是城市内部的工人、干部的身份分层制度。

从社会流动方面来看,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人们的身份转换及个体流动十分困难。凡出身在农民家庭的人,身份都是农民;凡出身在工人家庭的人,身份都是工人;而出生在干部家庭的子女最低也是工人。农民身份的人要想向上流动,成为工人或干部,工人身份的人要想向上流动,转变为干部,一般只能通过以下某一途径:一是升学,数量不多的农民子弟被相应的技工学校、中等专业学校或高等学校录取;二是通过国家在农村招工,数量极少的农村青年得以跳出“农门”,成为全民所有制或集体所有制企业的工人;三是通过国家在在职工中“招干”,数量极少的工人能够获得干部身份;四是通过应征入伍,一部分优秀的来自农村和城市的士兵晋升为军官或复员到地方给予安置,获得工人或干部身份。

这一时期,我国高等教育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有良性发展阶段,也有遭受毁灭性打击阶段。学历与身份的关系也很不稳定,受各种政治运动、社会运动影响很大。一些大学生可能一直在“上升”,按照既定轨迹运动,而一些大学生的命运可能就坎坷多了,甚至因为“拥有知识”而变成了社会“最底层”人员。当时社会主要还是以“阶级斗争”为主,培养和使用高级人才并不是国家的重点,高等教育也没有被提到国家建设的应有地位而被重视。从大学生个体来说,由于当时高等教育招生人数很少,只有极少数人才有机会上大学,“上大学改变命运”并不是社会的共识。尤其是“文革”时期,学历与身份的链接被硬生生地割断了。

### 三、恢复高考:重启我国学历与身份的特定链接

从1949到1976年的28年间,是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高等教育整顿、改造和探索时期,期间有良性发展阶段,也有盲目冲动时刻,更有人为制造混乱时期。但我党及时发现了错误并果断改进,于1977年恢复了因“文化大革命”中断了11年的高

考,重启了我国学历与身份的特定链接,表现在以下方面。

#### (一)“自由”报考

1977年8月13日至9月25日在教育部召开的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上,通过了《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从此恢复了中断11年之久的全国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制度。招生方针由文革时期的“自愿报考、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查”确定为“自愿报考、统一考试、择优录取”。虽然只是几字之差,但却是天壤之别。文革时期虽然是十六字方针,但到执行时都变了味,“推荐上大学”成为某些领导“权力寻租”的资源,只有那些与领导(农村是生产队长)能扯上关系或者有钱送礼的人才有机会上大学,没有考试,不论才能。而恢复高考的“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方针,重又把文化水平考察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同时放宽了招生年龄、婚姻限制,为老三届(1966、1967、1968)特别是大龄下乡青年上大学打开了一条改变命运的通道。修改了繁琐的政审条件,实行凭考试成绩“择优录取”。

#### (二)放弃“成分论”

改革开放前,我国长期实行“唯成分论”。“成分”曾是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使用频率颇高的一个词,是家庭成分的简称,指由个人的早期经历、职业和家庭经济状况所决定的社会身份、阶级类属。它在个人履历表里虽只占据普通一格,对个体命运的意义却举足轻重。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学说指导下,在处理涉及到关系个体重大命运的如升学、入伍、提干、入党、晋升等事件时,都要实行阶级路线政策。家庭成分作为阶级路线的直接反映,是划线排队的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因素。

在平反与“摘帽”工作完成后,“唯成分论”逐渐销声匿迹,“家庭成分”对于许多年轻人来说,只是履历表上一个普通空白项,不代表任何意义。随着这种成分制度的瓦解,亿万人摆脱了“家庭成分”的束缚,这调动了全体人民群众以极大的积极性投入到改革建设中。其中对人们影响最大的事件之一,就是恢复高考,所有有能力的人不论家庭出身,都可以报考,都可以凭借真才实学走入大学校门,而不是凭“推荐”、“关系”,可谓不拘一格降人才。

#### (三)恢复了“公平性”

作为一种人才选拔方式,高考应该是公平的。只有保持高考的公平性,其功能才能被社会成员广泛认同,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而恢复高考在一

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对公平理念的恢复。

恢复高考其实是恢复了普通个体通向上层的一个发展通道,它给普通人一个机会,可以通过这种相对公平的方式改变自己的命运。文革期间实行“推荐上大学”,上大学“走后门”蔚然成风,只有和领导、干部关系好,或者有门路,或者有后台,或者请客送礼的人才有机会上大学,严重挫伤了广大青年上大学的积极性,更损坏了教育的公平性,上大学不再是社会流动的正常渠道。1976年全国统一招生考试制度的恢复却能把社会最底层的、最贫穷的而又有才能的知识青年选拔出来,重建了社会的公平与公正,发扬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价值观。

1977年恢复高考不仅是高等教育领域的一场革命,更是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变革,它不仅改变了千百万热血青年的命运,改变了许多家庭的命运,更改变了国家的命运,预示着时代的巨大转折,重启了学历与身份的特定链接。

#### 四、学历与身份:新时期的链接

(一)20世纪80年代——高等教育身份功能的初显

20世纪80年代,高等教育的身份功能初步显现,学历与身份的链接开始逐步为民众所关注。

改革开放伊始,我国政府就颁布执行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社会改革措施,对社会进行了一次重构和制度创新。这次制度创新使我国的社会分层与流动发生了重大变革,即界定各阶级阶层之间关系的依据不再是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理论,而是现实的经济社会利益差别;人们在不同社会地位之间的流动,越来越依赖于他们自己所掌握的资源以及为了实现流动而付出的努力。我国的社会分化和流动模式开始发生转换,社会阶层逐步分化与多元化,社会流动也呈现出开放、弹性的流动性质。尽管一些先赋性因素由于社会的惯性还在影响着人们的社会流动,但“获致性因素”对人们社会流动的影响已大大增强。一个人凭着自己的勤奋、智慧和能力,有机会向上流动或向他所希望的位置流动。

这一时期我国的高等教育也渐次恢复与发展,学历与身份的链接逐步明朗。高等教育机会竞争的平等体现了“能力主义”的取向。“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成为当时流行的口号。“上大学,拿文凭”开始成为人们首选的流动方式之一。

对于农民这一传统阶层来说,上学可以彻底改变自身命运。大学毕业后国家包分配工作,直接就是干部;另外还可以进入一些中等专业学校如“中师”、“中专”、“中技”等,毕业以后做教师或是进工厂成为工人,都是吃“商品粮”的城市人了。传统的城市人口(以工人为主,少量干部)也把上大学作为自身流动的重要渠道。虽然城市青年吃“商品粮”,享有农村青年所没有的社会福利,他们有更多参军、招工、招干的机会,参加高考只是可以选择的流动方式之一,但也并不是每个城市青年都有被“招工”的机会,如果不能被“招工”,只能做“待业青年”,且在被招工后如果想成为“干部”也很难。考上大学,毕业后自然就成为了“干部”。所以,考大学对于城市青年来说也有很大吸引力。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无论农村青年还是城市青年,“考大学,拿文凭”都是其重要的向上层社会流动的途径。当时考上大学的青年学子,不仅不用交学费,甚至国家还给发补贴,生活费都有了。农村青年还能转户口,吃上“商品粮”。另外,当时大学毕业国家是包分配的,一毕业就是国家干部,没有找不到工作的烦恼。在这一时期,许多没有任何背景的人确实通过高等教育走上了领导和技术岗位,学历与身份的链接开始被民众广泛认同。

(二)20世纪90年代——高等教育身份功能的滥觞

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后,我国开始进入全面市场经济改革时期,经济结构深入调整,市场化程度也开始逐步深化,社会逐步走向开放,能力本位意识深入人心,影响个体社会流动的因素发生了变化,党员身份对个体流动的影响逐步减弱(国家的机关行政部门除外),教育资本对个体的影响逐步增强,学历与身份的链接也越来越强烈,我国社会初步显示出了“学历社会”的特征。

在学历社会中,文凭在安排或影响人的社会地位,如首次就业、经济收入、职务晋升、工作流动、社会声望等中起着相对于其他因素更大的决定性作用。崇尚文凭是工业社会的普遍现象,随着文凭在我国人民的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考试竞争越来越激烈,我国也表现出了许多文凭主义社会的典型特征:

##### 1.教育的工具价值凸显

作为教育系统,它有两种价值取向即本体价值取向和工具价值取向。教育的本体价值是指教育系统的结构和过程本身就充分体现出价值和意义,这是不依赖于外界的评价标准的。美国学者布

鲁巴克认为：“教育活动内在的价值就是我们不是因为它们对于另外某些事物有用，而是因为其本身就具有好的价值。它们的价值并不是它们对于另外一些在它们本身之外并已超过它们的价值有什么好处，而是它们本身所固有的、是内在的。教育的工具价值是指教育提供的结构和过程对外界所体现出的价值和意义。”<sup>[8](P101)</sup>教育系统必须具备三类“实用”的工具价值：(1)社会经济价值；(2)文化价值；(3)公民或政治价值<sup>[9]</sup>。

在学历社会，人们过分注重了教育的工具价值，即教育可以获得高收入、高地位、高身份；而忽略了教育的本体价值，即高等教育可以促进个体身心素养的综合发展，并获得职业与生活所必要的知识与技能。文凭社会的一些弊病逐步显露，如考试地狱、高分低能、教育浪费、学历贬值等。

## 2. 文凭的身份功能被放大

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随着我国改革的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社会流动机制由国家政策性安排向市场化方向变迁，市场和竞争机制激励人们以个人才能换取市场回报，政治表现的重要性下降，受教育程度作为个人能力体现出来。因为受教育程度与个人职业、收入、社会声望密切相关，高学历高技能是通向就业、晋升的桥梁，教育背景(或者说是文凭)在个人社会地位获得和社会流动中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教育作为筛选工具已经得到了广泛认可，许多单位主要依靠学历来进行各式各样的人才挑选。“学历与其它资源的分配具有很高的相关性，这意味着学历本身是一种稀有的资源，同时，获得学历是获得其它社会资源的手段。获得高学历便可从事威望高的职业，并由此获得较高的收入和较大的权力。”<sup>[10](P155)</sup>学历与身份的链接在20世纪90年代也达到了最强。

### (三) 21世纪初——高等教育身份功能的分裂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进入深度转型期，处在了一个非常关键的现代化建设阶段。中国社会变得比以前开放，社会流动加快，体现现代化进程的后致性社会流动机制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人们越来越信奉能力主义，重视个人的能力和相应的业绩回报。竞争选拔能人的做法得到普遍推广。而单位制、阶级出身、城乡二元体制等社会区隔体制和政策在不断地被削弱，有的已经退出历史舞台。所有这些都“有助于创建更富流动性和能人制的秩序”。

与此同时，作为最重要的后致性流动因素的

教育(包括高等教育)的发展也进入新的阶段。我国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逐步向大众教育过渡，人们从对高等教育资源的竞争向对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竞争转化。

1999年我国大学开始扩招，高等教育逐步从精英阶段向大众化阶段过渡。高等教育大众化时期的到来，使更多人有机会进入高校就读，也为国家培养了更多人才，但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情况，其中最重要的是大学生就业难。一方面，毕业的大学生越来越多，按照传统的就业观念和就业路径，许多大学生不能被“分配”，处于失业状态；另一方面，我国劳动力就业市场还没有完全规范与成熟，经济结构调整也没有彻底完成。这样，国家“包分配”的路子没有了之后，就业市场还不成熟，学生就业观念还没有完全转变，学生就业渠道还不足够畅通，致使一部分学生处于“毕业即失业”状态，虽然这几年国家开始把大学生就业问题提到了关系社会稳定、和谐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但每年仍有很大部分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这其中的原因是复杂的，既有社会的原因，也有大学生自身的原因，还有高校的原因。这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不是短时期就可以解决的。

也就是说，从21世纪初以来，高等教育的身份功能尤其是就业功能开始分裂，不像20世纪80~90年代那样，一纸大学文凭能够帮助个体获得一份不错的职位，而且获得较好的经济收入、社会声望及较为稳定的社会地位，而到了21世纪，高等教育文凭不再是获得好职位的尚方宝剑，许多人面临着“毕业即失业”的危机。学历与身份的链接开始分裂。

## 五、学历与身份：未来发展方向

### (一) 高学历仍然是获得高身份的途径之一

对于个体来说，可能有许多途径可以帮助他走向成功，走入上层社会，实现个人的社会流动。可能他的家庭很富有，有雄厚的经济资本；可能他的家庭有很高的社会地位，是当地所谓的名门望族，有丰富的社会资本；可能他出生在一个富有的国家富有的城市，占据了天时地利；可能他有聪明的头脑、良好的品格，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可能他有出众的才华或技能，比如在体育、演艺、文学等方面与众不同，这些都会成为一个人进行社会流动的资本，促使一个人完成向更高层社会阶层的移动，但这些资本都是可遇不可求的，只有教育

相对于其他影响个体社会流动的因素来说是最容易被个体把握的。因此,在未来能力主义与绩效主义社会,高等教育是最普遍、最大众、最易得的帮助个体向上层社会流动的方式。

### (二)高学历与高身份的链接是有条件的

高学历与高身份之间有特定的链接,也即高等教育对个体社会流动有重要影响作用。对于个体来说,高等教育能够促进个体获得较好职业、较高收入,完成代内流动,促进家庭地位的提升,完成代际流动,这个关于高等教育功能的良好预期能够实现,必须有一定的前提条件,也就是说高等教育作用的发挥必须以一定的社会形态、教育形态为依托,这些社会基础和教育基础是高等教育功能释放所处的具体社会过程和教育过程。具体说来包括以下几点:能力本位社会准则的确立、市场机制配置社会资源方式的确立、开放性的人才选拔评价方式的确立、优质教育资源的稀缺性、教育是社会流动性机构、教育能够培养出社会所需要的人才等等。

### (三)学历将恢复其本体价值:学习经历

未来,高等教育的工具价值即能帮助个体获得好工作、高收入等功能将式微,而其本体价值即促进个体综合素质的提升将逐步显现。接受高等教育获得学历越来越被个体看成是一种学习的经历,或者确切地说是一种人生经历,学历也即学习经历、教育经历对个体的影响将是全面的、立体的。美国学者派拉斯(Aron·M·Pallas)说:“与其将焦点集中在教育成就和成人社会经济成果之间的经验性联系上,不如将眼界放开些,超越影响地位成就的传统,寻找学校教育在多种机构领域中产生影响的证据”<sup>[11](P659)</sup>。他认为教育对成人家庭生活、对工作场所、对社会经济成就、对知识和认知发展、对政治和社会参与、对价值观、对闲暇时间

利用、对身心健康等方面都有积极的影响作用。简而言之,学历将越来越成为一种学习的经历,这种经历对个体未来生活的影响是长期的、缓慢的、全面的,而不仅仅是高身份、高地位这么直接而简单的结果。

### [参考文献]

- [1] 马克斯·韦伯.身份群体与阶级[A].大卫·格鲁斯基.社会分层[C].维斯特尤出版社,1994.
- [2] 王天一.外国教育史(上册)[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 [3] 杨学为.中国考试制度史资料选编[M].合肥:黄山书社,1992.
- [4] 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
- [5] 陈振中.论教育身份[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5.
- [6] 王奇生.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1872-1949[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
- [7] 叶赋桂.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与社会流动:1840-1922[A].张斌贤,王晨.大学: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C].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 [8] 布鲁巴克.现代教育哲学[M].纽约:麦格劳—霍尔公司,1962.
- [9] Clark Burton R. The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Academic Organization in Cross-National Perspective [M].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 [10] 张人杰.国外教育社会学基本文选[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 [11] 阿龙·M·派拉斯.学校教育对个人生活的影响 [A].莫琳·T·哈里楠.教育社会学手册[C].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陈梅云]